

那一抹红

石悦



凝望 张永生 摄

这是一张四寸黑白照片，我刚入伍时的留影，片面有点发黄，我稚气未脱的脸上漾漾着青涩、羞怯和喜悦，眼神中充满对未来的憧憬。

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真正成为了一名战士。起床号，出操号，吃饭号，集合号，熄灯号，冲锋号，声声相许，日复一日。军营是军号主宰的世界，军号声响起，军人的使命便呼之欲出。那种扣人心弦又催人奋进的嘹亮号声，教给我什么是纪律和自由，什么是军威和军魂。“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”。我们在炎炎烈日下握钢枪，迈正步，必须将军帽戴得端端正正，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；在凛冽寒风里列队前进，棉帽两边的耳捂子不准放下来，宁肯冻僵耳朵，也不能损害军容、军威和精气神。

照片上立于我左边的是张建民，他身躯挺拔，英姿勃发，脸上有城市兵常有的无所畏惧的表情。建民是上海人，比我早两年当兵。那时部队作兴“一帮一、一对红”，指导员安排他帮带我，说城市兵之间容易沟通。建民性格开朗，是“乐天派”“开心果”，能让新兵不想家，老兵葆青春。我俩第一次交流，他就对我说，军营“四大怪”：“裤子胖得像麻袋，被子不分里和外，帽子洗了不用晒，当地姑娘不能爱。”我忍不住偷笑。有天，他故弄玄虚地贴近我耳朵，说连长是头号“怪”：野营拉练，大路不走走小路，不进城市钻山沟；摸爬滚打，专挑酷暑严寒，单捡坑坑洼洼，故意亲近冰雪泥巴；拼刺刀，“杀，杀，杀”，逼得你把嗓子喊哑；练瞄准，“三点一线对准靶心”，直瞄得眼睛发花。“但怪也不怪”，他突然改腔换调，“练为战，一茬一茬都这样。”

照片中在我前面端坐的是排长王锡良，他黝黑的脸上挂着微笑，炯炯有神的双眼里闪着坚强的目光。当年人武部将我们在安庆市汽车二连后面的地委干校集合起来，列队前

往大轮码头，简短的交接仪式上，他与人武部长互敬军礼，一声口令“出发”，就迈开大步，率领我们踏上征程。那种气宇轩昂和雷厉风行，让我至今难忘。

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安庆，又不知道去哪里，心里敲着小鼓。稀里糊涂地跟着上船，与素不相识的同伴们挤在一起。大轮缓缓离开码头，眼帘中的振风塔越来越小了，此时，鼻子有些酸酸的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我不敢认怂，别人也是。偌大的船舱先是鸦雀无声，接着有了些微抽泣音，过了“马窝”，竟有人嚎啕大哭。这个时候，接兵的人站起来，给我们讲“好男儿志在四方”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讲“一人当

兵，全家光荣”“军人流血流汗不流泪”，还领着我们唱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”。我的情绪不在点上，只能跟着哼哼和和。倏忽，一位叫韩传梅的新兵自告奋勇站出来，唱了一段耳熟能详的黄梅戏，还做了一套组合式前滚翻，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，你一句我一句，顷刻间，朗声笑语，溢满船舱。

船到了南京港。上岸后，我们直奔下关火车站，休整、进食，然后整整齐齐地上火车，正襟危坐在各自座位上。绿皮火车吭哧吭哧地喘着，咣当咣当地快速奔驰两三个小时，抵达苏州。车门刚一打开，那位接兵人就大吼一声：“全体起立，排队下车！”下车，上汽车，按部就班，秩序井然。几

十辆军车，载着上千名新兵，纵队行进，浩浩荡荡。

到达连队营房前，排队点名，分配去向，我被分到指挥排侦察班。班长，大名顾忠，从崇明岛过来，就是照片上坐在排长右边的那位超期服役五年的老兵。他的面庞如同刀削斧刻般棱角分明，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凛然正气。他迈着正步朝我走来，拎起我的行李就走。走进寝室，他指着一张床，和颜悦色地对我说：“这是你的铺，我就睡在你旁边。”好暖心的一句话，让我紧张、胆怯的情绪瞬间云开雾散。接着，他手把手教我整理内务，从叠被子开始，先是将被子平铺压实，随后纵向三折定型，最终捏出棱角分明的“豆腐块”。他让我试试，要我在一叠一铺、一摆一放中，学会克制、随意，培养有条不紊的生活习惯，让自律成为生活底色、人生常态。

忙完内务，班长又亲手将我的帽徽领章订好，风纪扣扣好，上下端详、左右打量一番后，让我立正，庄重严肃地对我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战友，有仗一起打，有难一同扛。”说完，将我领到军人服务社，说照照相寄给爸爸妈妈。恰巧，接兵人也在那里，他在安庆时曾与我父亲握过手，与母亲对过话。我灵机一动，想寄张与他合影的照片回家。班长成全了我，并给我介绍，说他是排长王锡良。我还在诚惶诚恐，班长已请排长先坐下，招呼我们站好，摄影师眼疾手快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四个人的合影诞生了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我依然深深爱着这张照片，因为我骄傲自己曾经是一名军人，珍惜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。端详这张照片，如翻阅一页人生，观照一段岁月，拜会一些战友啊！我特地请人为照片上了一层透明“保鲜膜”。只要生命没有枯枝败蕊，我都会时不时将这张照片请出来品味、怀想，让那一抹鲜红，永远在心中闪烁。

穿越成都老巷

石维明

卧牛巷、筒车巷、杀猪巷，在成都的西城区（今金牛区）曾经家喻户晓，有盐有味。

从沙湾进城，通常是经过马家花园，斜穿过卧牛巷或筒车巷或杀猪巷，然后来到北巷子十字路口，往前，是南巷子（今三洞桥路），通向王建墓（现称永陵）、带江草堂；往右，可到草堂电影院看电影，经石灰街、花牌坊街，到老西门、营门口；往左是进城的路，上世纪60年代、70年代一度改为“红光西路”，路上有“红光电影院”，现改回老地名，分段称西月城街、西大街、八宝街、青龙街。

筒车巷北起马家花园口，南出北巷子（今并入金仙桥路）。旧时，这里是荒地、农田，苗条的桃花江舒缓地从此流过。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桃花江上茂密的竹林倒映水中，两侧稻田、菜地交错。春天，蜜蜂飞舞，油菜花一片金黄，夏日夜晚蛙声阵阵。桃花江上可见筒车。筒车利用江水冲力，转动圆形的大轮盘，轮盘边缘固定的若干斜状竹筒，在低处的河中装满水，转到高处，倾

倒入水槽，再顺着田边沟渠流入农田。沿河是土埂，百姓把这土埂叫筒车埂。抗战时期，老成都城墙内的一些居民疏散这里，建起了一些平房，街巷逐渐成形，起名为“筒车巷”。

卧牛巷比筒车巷短一些，宽一些。旧时这一带距离城墙内的满城较近，系满城居民去世后的坟地。坟地中央，有一较大的土堆，远看，好像一条卧着的牛，百姓称之为“卧牛台”。抗战时，城墙内的一些居民在这里建起平房，形成街巷，命名为“卧牛巷”。

现已消逝的杀猪巷，是三条巷子中最狭窄的一条巷子，两边民居墙壁高耸。它的形成年代和筒车巷、卧牛巷相似。传说曾经有屠户在此居住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杀猪巷最窄处可能只有一米左右。两辆自行车相向而来，是很需要骑车人有点技巧的。

中学时，我和两名同学曾经“比赛”，一起从马家花园出发，分别穿过筒车巷、卧牛巷、杀猪巷，看谁先到草堂影剧院。季军负责买电影票，亚军负责买豆沙冰糕。理论上穿越杀猪巷

距离最短，但是，由于它的狭窄，因而存在变数，说不定反而影响速度。我决心赌一把，选择走杀猪巷。三辆自行车从马家花园的铁道兵工程指挥部大院门口出发，风驰电掣，你追我赶。非常不巧，那天杀猪巷行人较多，同向有几辆自行车，但我高难度超车，过了！谁知对面一老伯推着一辆鸡公车迎面而来，三个轮子的鸡公车几乎把巷子填满，“嘎吱嘎吱”声越来越近，响个不停。无奈，我只好下车，举起自行车，侧身，紧贴着鸡公车挪过……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筒车巷、卧牛巷、杀猪巷逐渐修起了二层、三层、四层房子，底层出现了面馆、包子铺、油条铺和茶铺，后来又出现了麻辣烫、串串香。1990年代，筒车巷一家刀削面馆成了我的早餐食堂之一。这家十余平米的刀削面馆只在清早和上午卖货，大灶总是烧得很旺，大铁锅开水翻滚。老板是一名中年汉子，白白净净的皮肤，圆圆滚滚的肚皮。客人一进店，老板就把案板上的韧性十足的面团扛在肩上，手持可以削铁

的利刃，对准翻滚的铁锅一阵狂削，只见白色的面片纷飞，扑向锅里。我既觉得刺激，也非常担心他稍微走神会削到他白嫩的肌肤。只不过十几秒，几十片齐了。老板放下面团、利刃，点上一只黄果树香烟，吐出几个烟圈。然后长长的筷子夹上几片小白菜扔向铁锅，半分钟，刀削面起锅。最后向碗里倒上一勺秘制的瘦肉“绍子”，端到客人桌上，一气呵成。

有一次外婆背着我到城里走亲戚。晚上回来时，天几乎全黑了。从北巷子进了三条巷子中相对最宽的卧牛巷。光线非常暗。外婆一路走，一路偏过头来和我说话，让我不要怕黑。出了卧牛巷，前面不远处就是马家花园，两旁是夹竹桃，红、白、黄色的花儿香气袭人。相隔很远有昏黄的路灯，似乎是一个倒扣的陶瓷碗，下面栽着一个白炽灯，影影绰绰。外婆说，快了，解放军叔叔就在前面了。

远远地看见铁道兵工程指挥部大院的大门了，那里总是站着一名身姿挺拔的解放军战士，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一动不动。外婆回过头来呼唤我：“看见解放军叔叔了吗？他们是打坏人的！这哈（下）安全了！……”

几十年过去了，每次经过马家花园路，看见旁逸斜出的夹竹桃，脑子里就会浮现这个场景，泪花就会包不住，思维就会穿越。而岁月是经不起穿越的啊。

